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WENYI BAIJIA

文艺百家

百家

2006.2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WENYI BAIJIA

文艺百家

2006.2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百家. 2006. 2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安徽省文联文艺
理论研究室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1110-331-1

I. 文... II. ①安... ②安... III. 文艺评论—中国—现代—
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2403 号

文艺百家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68
发行部 0551—5107784
E-mail ahdxc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刘云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60千
印张 11.25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31-1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文艺百家》编委会

主 编：苏 中 查长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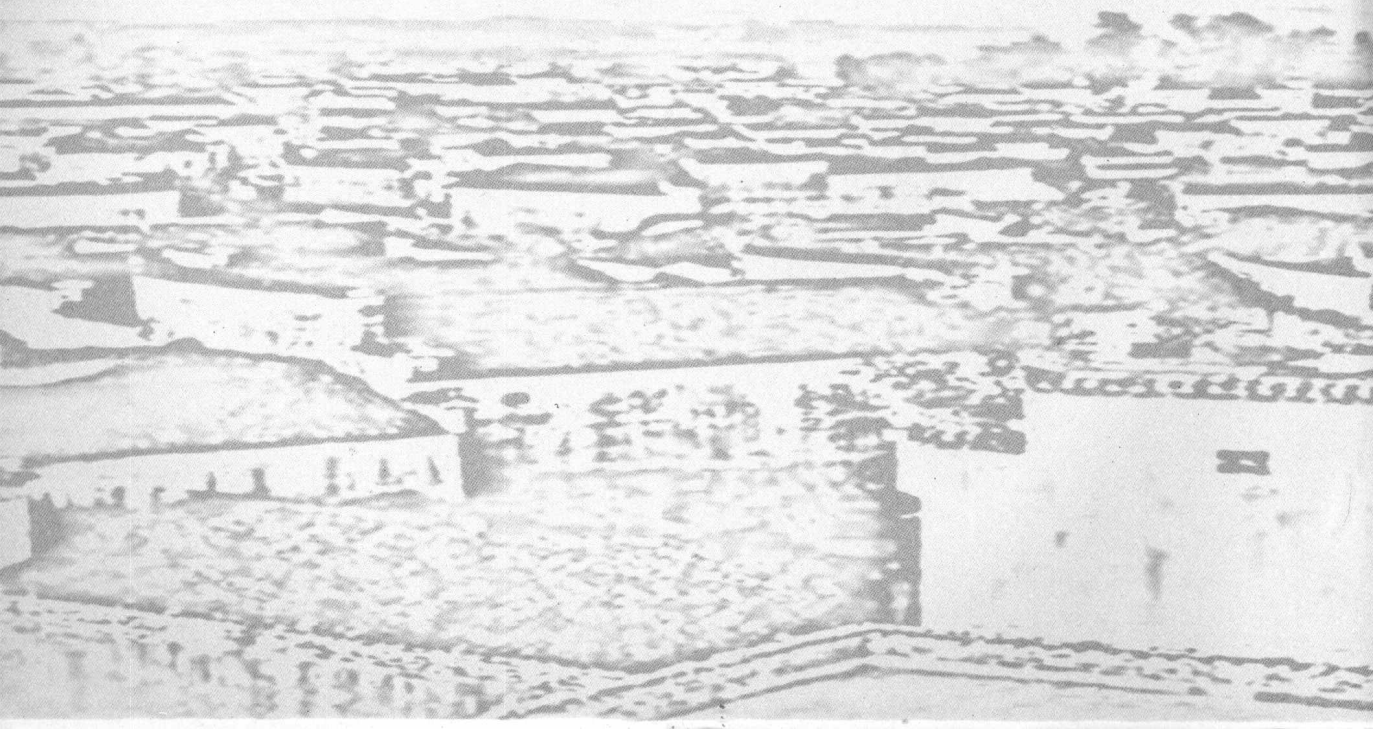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安 王达敏 王宗法 乔延凤

刘继潮 苏 中 张启生 余国松

段儒东 施晓静 唐先田 唐 跃

钱念孙 康诗纬 谢昭新



目 录

2006.2
文艺百家

和谐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

- 和谐社会建设与文艺批判精神 钱念孙 (1)
- 和谐理念与当代文学思维 赵 凯 (4)
- 庄严的使命:用和谐文艺为和谐文化专列提速 方雪松 吴 頔 (9)

专题研讨

- 徽文化对安徽书法艺术发展的渗透及其影响 王亚洲 (14)
- 从现象到流派
- 对太和书法现象的思考 秦金根 (22)
- 近现代寿县书家概说 夏长先 (26)
- 论皖派印风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阮良之 (33)
- 安徽当代书法综述 方茂鸿 (42)
- 探书学精妙要义 唤书法地域新风
- “2006 安徽文艺论坛”安徽当代书法创作的观察与
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 施晓静 (49)

作家作品论

- 卑微者人性精神演进的表征
- 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及其人道主义内涵 王达敏 纪 念 (52)

沉淀于“角落里”的“温柔”

- 石楠长篇小说《生为女人》解读 阮 征 (59)

乡土家园的守望者

- 曹多勇笔下的“大河湾意象” 孙仁歌 (63)

- 长篇小说《镇委书记》的定位及其艺术特色 乔延凤 (68)

在极致状态下破译人性密码

- 读严歌苓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高 莹 (72)

陈家珍、李兰形象之比较

- 余华小说谈片 王海洲 (77)

- 与“底层”百姓相通的真情吐诉 张 恬 (81)

在坚持追问和选择的途中

- 论叶世斌诗集《在途中》的诗性哲学 许春樵 (85)

艺苑纵横

不一样的浪漫青春

- 谈当下热播的文革军旅题材电视剧 彭 佳 (90)

-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空间 郜雪屹 (95)

- 论中国第三代实验戏剧的现代性 杨四平 (99)

- 从唱腔、语言谈京剧徽剧之间的渊源关系 谢林义 (103)

长庚光辉照后人

- 纪念程长庚诞辰 195 周年 李光南 (110)

- 《茉莉花》花开何处 冯光钰 (115)

生命的颤动与诉说

- 关于音乐的畅想 周春阳 (125)

传承与创造

- 发展中的安徽油画 杨国新 (130)

永远应当续写的青春笔触

- 康诗纬早年小幅油画作品掠影 棠 樾 (134)

- 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文化意义 张 甦 (137)

文艺观察

- 在坚持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坚守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卞国福 (143)
- 副刊与作家在时代的潮头共舞 郜 磊 (147)

2006精彩述评

皖山皖水谱新曲 微风徽韵铸舞魂

- 2006年安徽音乐舞蹈述评 朱继胜 (153)

时代的精彩瞬间

- 安徽省第15届摄影艺术展获奖作品评析 康诗纬 (163)

新作短评

赋予自然的灵魂

- 陈雅玲作品印象 沙 鸥 (170)

众手浇开淮上花

- 浅谈《东方芭蕾·凤台花鼓灯》 王玉佩 (172)

序与跋

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的颂歌

- 序《春华秋实》 徐子芳 (174)

和谐社会建设与文艺批判精神

► 钱念孙

毫无疑问,“和谐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特殊社会形态,而是每一种良性发展的社会都力求达到的一种理想的整体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之外,再去构造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下社会现实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定方向前进,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过程中,追求和形成一套使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良性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我们的社会整体上达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态。对照这一要求可以发现,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社会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和谐社会所应具有的内涵相比,显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和谐因素,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这就告诉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正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并在化解矛盾中不断前进、不断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过程。

因此,文艺家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其创作就既不应无视社会问题,更不应抹煞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当然包括要求文艺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营造欢乐祥和氛围、提供消遣娱乐的喜剧性作品,但更需要文艺家以冷峻的眼光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揭示现实中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要做的工作,也是文艺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由此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国民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全体国民都从改革发展中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充裕带来的实惠。可是,近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表明,普惠式的改革发展时代已经挥手远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扑面而来。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激发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经济成分的活力,并促进了社会财富的较快增长,但迅速增长的财富却没有全面兼顾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整体即社会不同阶层。国家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正日益尖锐、突出。

正因如此,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就要正视和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客观对

待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冲突。简略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国际上有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叫“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是0.17,而到了9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0.43以上,现在当然还要高,可说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二,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众所周知,我国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及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尖锐的“三农”还问题没有解决,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已被推到前台。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根本无法享受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且表现在他们有时连合法的劳动报酬都难以得到,更不用说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条件及其受到的多种歧视了。

其三,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持续拉大。我国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落差十分明显,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境遇并没有太大改变。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商品市场高度兴旺的形势下,我们却忽略了加强与市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建设,致使公民的道德水准下降,社会不正之风蔓延滋长,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严重缺失。

其五,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是在现实中效率优先却存在着向效率至上乃至惟利是图转化的倾向,社会公平和正义没有得到很好维护,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成为民众的核心价值观。

其六,政治和法制发展滞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对经济及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提升不够,有时不是越位就是缺位,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在不少地方却是藕未断丝更连。法制建设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水平都依然落后于时代要求。

其七,人际关系不够和谐。尽管斗争哲学早已被时代所抛弃,但由于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利用的过度化,导致在不少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只讲竞争,少讲合作,只讲防范,少讲互助,良好的人际关系远没有普遍形成。

其八,人与自然关系失调。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是以牺牲环境、消耗资源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取得的,它不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且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出现了严重危机。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探求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无法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文艺恰恰在这一点上,即反映社会矛盾、担当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严重不足。我们今天的文艺,更多地以生活化、通俗化、非政治化和个人化的方式,反映广大民众的世俗生活及欲望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关心大众趣味和市场效益,而不是反映社会矛盾和担当社会责任;它向人们提供娱乐和快感,许多情况下也伴随着对社会矛盾和人类正义的消解;它在张扬人们物质意识、财富意识的同时,淡化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提升;它在提倡生活多元化和个人生活自由的同时,解构了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善恶是非判断;它在上演

一出由俊男靓女演绎的爱情悲喜剧时,模糊了人们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正确认识;它在将现实和历史中的一切作为调侃、戏说的对象时,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崇高事物的敬畏感,也否认了人们追求真善美和摒弃假丑恶的意义;它在着力展示豪华奢侈的生活场景和时尚潮流魅力的同时,制造了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已经迈入繁华盛世的假象,掩盖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等严峻现实。

总之,我们今天的文艺更多的是在向人们描绘一幅歌舞升平的盛世图景,编织一出温馨甜美的轻型喜剧。它以刺激和满足人们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望和快感为能事,并在这种刺激和满足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不问这种刺激和满足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世道人心。当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到文艺领域时,我们要防止文艺创作中出现过分粉饰生活的“无冲突的和谐论”,而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原理为指导,构筑“冲突一和谐互动论”。

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因而文艺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态度和严肃的批判精神。所谓“冲突一和谐互动论”,就是要求文艺家正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问题,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与不和谐因素,通过反映深层次的矛盾冲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协调、更加和谐的方向演进。

不论是人类认识的提高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反思和批判的维度。只有对现实、对已有的认识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人类社会才能获得持续进步的动力,才能根据变化的情势不断调整自己的前进步伐和发展目标。如果缺少这样一个反思和批判的维度,人类的认识就会停滞不前乃至故步自封,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人们对社会病态熟视无睹,使社会病态常态化。

正是如此,在当前文艺越来越注重商业利益,以世俗化消解反思锋芒、以娱乐性代替批判精神的形势下,我们呼唤文艺家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担当起文艺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创作出真正无愧于时代的具有重大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这样,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和谐理念与当代文学思维

►赵 凯

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宏伟目标,为我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实践明确了方向。但如何把握和谐理念深刻的辩证品格与人文内涵,如何梳理人类思想与文化发展中和谐精神的历史走向与社会影响,从而辨别与引领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仍然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批判与和谐——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辩证法精神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它为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构建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既是批判的学说、斗争的学说,也是追求自由与和谐的学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法精神所决定的)。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因此批判与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也称自己的学说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抛弃”,而是充满着历史辩证精神的“扬弃”,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肯定,最终实现对一种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构建。这其中仅仅强调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对立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为特征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称其为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黑格尔自我说明,“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它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其二,它是由“正”经过“反”再到“合”的三段式方法。在谈到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说:“只要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辩证的性质,深入观察一下,就会看出每一个概念一般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二律背反的真正解决只能在于两种规定在各自的片面性都不能有效,而只是在它被扬弃了,在它们的概念的统一中才有真理”。^[2]黑格尔非常重视“扬弃”,“扬弃”是辩证的否定,它包含着肯定的东西,其结果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事物矛盾的展开及其解决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而康德哲学把矛盾和否定作为事物发展的总体,最终陷入“不可知”论与神秘主义。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是“否定的辩证法”,恩格斯对辩证法作出规定时也指出“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3]列宁也认为,“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所强调的是

事物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不是客观精神与自我意识,而是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本思想的重视与开掘,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与当代传承中的重要成果与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它还是丰富而深刻的“人的学说”。譬如,在论述人的本质时,马克思不仅有大家熟悉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物性”这一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包含着肯定和揭示世界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以对人的全面和谐的特性的揭示去对抗人的“异化”,从而建立新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唯一能够将自然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加以整合的存在物,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正是这种整合的结果。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建立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状态与社会的精神危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就企图建立一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并把他们所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或“和谐—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指出这些论述的空想性质外,同时对消灭阶级的对立、提倡社会和谐的理念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马、恩进一步认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的私有制,是造成生产关系对立性质的根源所在。因此,对私有制的扬弃是实现真正和谐社会的历史前提。这其中就包含着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从对立斗争到和谐自由的推移、转化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正是在分析与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局限性与理论缺陷后,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不仅描绘了设想美好的未来社会,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与历史途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就深刻概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也是我们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二、和谐理念是对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历史传承

和谐是人类生命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追求,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与西方诸民族的文化精神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民族性而言,是追求和谐的文化。在处理事物矛盾关系的态度上,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儒学的最高范畴“仁”就是一种寓含着人与人

之间亲善协和关系的精神境界。孔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劝诫，可以看作是孔子理想社会风范与理想人际关系的信条；孟子倡导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宋代张载最早使用“天人合一”的命题：“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天人合一”主张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样，中国古典美学自孔子始，就强调美与善的和谐统一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孔子对《韶》乐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孟子从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出发，对美的内涵作出界定：“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外，从儒家中庸之道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审美标准——“中和为美”，更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种强调情理平衡与和谐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标准，对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追求和谐并非追求“同一”。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论中还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朴素的辩证法原理。《国语·郑语》记载了史伯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并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谐包含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相济相成”与“相反相成”都同样体现了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两家学说，既有离异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在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与儒家一样是追求和谐、排斥冲突的。老庄尽管避弃现实，却不否定生命。他们以崇尚自然与效法天地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基本准则。与儒家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他们对和谐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他们企图以道来消解社会的阶级差异，弥合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失衡，以恢复个体精神的和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尽管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其中表现出的宽容处世、自由平等的精神指向却值得肯定。庄子所倡导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与自然天地平等而和谐的理念，是道家哲学的根本命题之一。

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脉络是泾渭分明的。应该说一切理性主义哲学的精神指向，都是追求自由和谐与统一。西方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作为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就曾断言：“一切皆在流转，对立面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述中也表达了质料与形式、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观念，当然他只是在可能性中而不在现实中肯定对立面的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根据“数”的原则来剖析美，认为美在于“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6]康德美学则是在鲍姆加登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理性联结的中介，重点分析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力图使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而黑格尔则是“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7]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以前，辩证法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自觉与系统的表述。黑格尔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致力于在人的精神世界去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西方现代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美学研究

(如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诗学转向与历史转向等),尽管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规律和法则的解构与颠覆性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带有明显的盲目超前的性质,但其对于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为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一个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的思维格局却颇有帮助。当代西方美学研究(如生态美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所关注的如何化解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人文情感与社会理性、人性祈求与历史规律的矛盾关系等理论命题的探讨,从客观意义上来说,都有利于人类自身的自由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大厦,并不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应该成为我们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当代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与和谐意味,也应该成为人类文化与文学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历史传承。

三、和谐理念——当代文学思维的视角与焦点

文学是人学,和谐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态势与走向,大概可以定位为多元共存与多向选择。一方面,文学的商品化正在向文学的审美品质与创造性提出挑战,文学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趋向正面临着腐蚀与消解,这是不可回避的文学现实;但另一方面,文学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文学要素的丰富多样与创作主体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由显现,文学从政治与阶级斗争的维度向审美与艺术维度的转移与回归,已成为创作主体的自由选择与实践。这些都拓展了文学在当代的生存空间,展现了文学的意义生成与价值取向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就是文学的审美境界,也即文学的和谐境界。这样,文学参与当代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基本内涵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便成为可能。构建和谐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自觉确立一种以和谐理念为基础的当代文学的思维观与价值尺度。传统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文学思维定势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调整与更新。必须营造出一种宽松宽容与自由和谐的文学氛围。要纠正当下那种时尚的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即否定是深刻的而肯定则是浅薄的,批判是深刻的而歌颂则是矫情的。这种把肯定与否定、批判与歌颂的有机关系简单割裂的思维逻辑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对文学批判精神与否定意识的表面化认识。批判与否定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全部属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文艺批评正是通过对对象的价值批判与价值重估以实现对象的超越并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与统一。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臧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8]批判与歌颂的有机联系,不仅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不仅表现出作家批判罪恶与腐朽的胆识与勇气,艺术地体现出特定生存环境中灵与肉的搏斗,折射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新的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商品潮所带来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生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欲望与理性冲突,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作家展示人物命运沉浮的现实背景。但作家们并没有到此停住笔触,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同样鲜明地彰显与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呼唤,同样正面表现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感化功能与道德诉求,对于人类社

会正面而进步的精神价值,给予了热烈的渲染与张扬。批判的锋芒并没有遮蔽作家的审美理想与人文关怀,在对假恶丑的嘲讽、鞭挞与否定中同时表现出对真的肯定、对善的牵引、对美的呼唤。文学作品中的和谐精神与和谐境界,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理念与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生态批评与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辨,对于当代文学思维视角与价值的调整与重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生态批评整体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一种世界观的姿态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文学生态学将历史承载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和生态责任。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信仰、伦理和审美生存的诗学特征,最终建构人、人类文化与自然、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新人文精神”。^[9]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生态危机与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是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桎梏。因此,“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由此可见,这种生态世界观不仅不是反人类的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更宽泛的人道主义——普世性的仁爱精神”^[10](曾繁仁语)。随着生态批评与文学生态学对文学实践的介入与影响,它的研究范畴就已经突破了对当代环境文学以及与自然相关的文学文本的解读,它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向文学的终极关怀——文学在整个人类自然生存中的责任与使命。这样,重读经典与重构经典就在所难免。生态批评与文学生态学研究致力于化解乃至消除人类生存与自然存在的恒定矛盾关系,其中所包含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对当代文学思维方位与向度的调整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200—201页,商务印书馆,196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73页。

[6]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感》,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8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页。

[8]熊元义、余三定:《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载《艺术广角》,2006(3)。

[9][10]《生态批评三人谈》,载《文艺理论》,2006(9)。

庄严的使命：用和谐文艺为和谐文化专列提速

►方雪松 吴 頔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总书记的这段讲话，不仅高屋建瓴地阐明了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前进方向；还是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任和语重心长的嘱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必须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从而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庄严使命。

—

社会和谐召唤着和谐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召唤着和谐文艺。因为文艺作品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这个民族文化最具特征、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符码。《论语》和《孟子》，在中国历来是被当作儒家文化的大旗飘扬至今，中国的“国学”，也就是传统文化，一提起来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历代先贤大儒的著述。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造出优秀作品的文艺家们）总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的精华和进步文化的标志，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传诵不朽。先秦诸子的散文，历经数千年仍然能给予今天的读者以思考和启迪；但丁的《神曲》，敲响的虽只是欧洲中世纪的丧钟，但仍不失为现代文明的一面“风月宝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鼓舞过当年参加救亡图存伟大斗争的中华儿女，也让今天每一次唱响她的中华儿女心中澎湃起一种庄严、一种神圣和一腔战斗豪情；《阿Q正传》、《女神》等经典文学作品，让不同时代各种肤色的人们在阅读和欣赏中获得无与伦比的震撼、颤栗和亢奋……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小至衣食住行，大到文治武功，只有文艺作品因其典型形象和艺术形式所独具的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才能给予人类心灵以深刻的观照和强烈的感动。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就这样在拓展人们的事业、激励人们的斗志、锤炼人们的品格、提升人们的情操、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过程中，显示出文化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同时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对人的陶冶、感化和教育，使向真、向善、向美成为人类自觉的精神追求过程，也使得人类文化活动无论在精神品格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因此得到新的提升和发展。进步优秀的文

艺作品在文化建设中的这种引领作用,决定了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学艺术家既荣光无上又责任重大。

中国的进步文艺家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自觉意识的群体。从古代开始,那些进步的文艺家们总是用自己的作品去讴歌真、善、美,去与邪恶与黑暗生死相搏。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龚自珍,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关汉卿用他生命创作的《窦娥冤》,在黑暗的社会里为底层世界不屈的灵魂点燃了一盏明灯;汤显祖用自己精心构筑的《牡丹亭》为自由而美丽的爱情呼唤呐喊;吴敬梓则以一部《儒林外史》,向封建科举投去了锋利无比的匕首;而曹雪芹则用那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红楼梦》,为我们再现了封建末世的丑恶与美丽……到了现代,中国白话文和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从文艺形式(语言文字)的革命开始了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掀开了中国现代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可以说,文化史上的任何变革和前进,都是先经由文艺尤其是文学开始而后才浸淫到文化的其他领域。中国历史上那些进步文艺的先驱者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心泪,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与日月同辉的文艺作品,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实践,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且,他们还用自己的创作为今天的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们,树立起了用优秀文艺创作促进先进文化建设的榜样。

二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理想中的最高目标。从先秦时期的“小康”、“大同”到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说到底都是一个追求社会和谐理想的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总结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次准确表达。“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和谐文化自然成为和谐社会的一种召唤,成为和谐社会的特征和推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本思想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建设和谐文化的落脚点和归宿。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应该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文化,要达到这种全面进步、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尺度。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整合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

作为和谐文化最具特征、最具影响力的和谐文艺,理所当然要具备和谐文化的本质属性,即和谐文艺应该是建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上的文艺。笔者坚持认为,和谐文艺应该是讴歌和谐人生、服务和谐人生的文艺,和谐人生应该成为和谐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这就是时代赋予我国文艺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应该说,我国的进步文艺家们一直在为和谐人生而努力地进行着艺术的实践活动。屈原的《天问》,应该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文艺意识的杰作,而他的《离骚》,则是人